

财政史研究

(第二辑)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史研究所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政史研究. 第2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史研究所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095-1763-5

I. 财… II. 中… III. 财政—经济史—研究—中国 IV. F8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1278 号

责任编辑: 张振中 李亚京

责任校对: 李 丽

封面设计: 郁 佳

版式设计: 汤广才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13 印张 281 000 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ISBN 978-7-5095-1763-5/F·1491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88190744

《财政史研究》编委会

顾 问：李俊生 孙翊刚

编委会主任：马海涛

编委会成员：李 燕 王文素 马金华 张劲涛 李 佳

主 编：王文素

前 言

中国财政历史，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在为民族昌盛、国家富强的奋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财政思想和精深的安邦智慧，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文明宝藏。

财政虽然属于经济范畴，但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创造的劳动成果日趋丰富，私人占有财产形成一定规模，凌驾于普通百姓群体之上的权力集团随之出现，所需公共事务开支就必然对私人经济部门进行再分配——早期的财政产生了！我国舜禹时期，正是人类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年代。当黄河、淮河流域的水患基本治理平复，两岸居民有了安居和生产的条件后，大禹划地居民，在组织生产、生活的同时，通过对版图内自然环境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居民赋税贡纳制度（见《尚书·禹贡》）。规定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纳赋（土地税）、进贡（山林出产税）的义务，根据地质、地势和产出品种确定不同的税率及贡物，体现了区别对待、公平负担的财政原则。所以司马迁肯定地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见《史记·夏本纪》）。进入西周时期，相传周公制定了集夏、商以来国家机构设置（包括财政经济管理机构）及其职责、职权的制度大全《周礼》；西汉中，司马迁作《平准书》、《货殖列传》专篇，前者为西汉前期的财税制度，后者为秦汉时期的经济地理。自此，各朝代国史均设《食货志》为财经专章，沿袭至清朝。

“以史为鉴”始终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治国平天下，史学工作者治史的金科玉律。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说：“历史果何等学问？治之果有何用耶？自浅者言之，则曰：史也者，前车之鉴也”。“史也者，所以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者也”。“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司马迁所著《史记》，人称“事覈词简，是称实录”。财政史的研究，亦是对财政思想、发展规律和实践经验的记述及科学总结。我们不仅要运用现代财政学理论对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各种财政现象作定量和定性的分析、研究，从中提炼出财政制度变迁史研究的理论框架，还要进而揭示财政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现代财政学理论的研究做出贡献，为未来国家财政政策、制度的设计提供发展趋势的建议。

我们确定的财政史研究范围是中国古代至近现代的财政史实；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思想；研究内容是以中国财政制度和财政思想为核心，并将关系密切的货币金融、会计、审计、贸易等部

门经济史融合一体,构成独具特色的中国财政体系;重点研究中国古代与近代社会中居支配地位或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对中国财政制度和理财思想的形成、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从中西方的社会性质、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文化、宗教、地理环境的差异中,探寻中国财政制度、财政思想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在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与价值。

财政史展示的是一个宏大而久远的课题,为了把对她的研究推向更高的阶段,对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央财经大学各届相关领导和教师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我校曾经编著并公开出版了第一部《中国财政史》教材;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财政史助教进修班;成立了中国财政史研究所,并创建了第一个“中国财政史”研究网站;承办了第一届全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年会;举办了第一届财政史教学国际研讨会。我们一直在努力奋斗,力争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史学科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特色鲜明的成熟学科,成为实质性的全国财政史教学科研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在向前发展,新的事物不断涌现,财税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迎接新的使命和挑战。为此,在中央财经大学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创办《财政史研究》系列出版物,以期为全国广大财政工作者,理论研究者、教授、专家提供一个探究财政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实的平台。为此,我们希望各位专家、教授和广大读者热心参与、勤奋耕耘、精心呵护、精诚合作,共创财政历史研究的繁荣局面!

目 录

先秦时期的财政与民生	孙翊刚(1)
西汉前期的农本思想与农税政策分析	赵梦涵(21)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负担研究	赵云旗(26)
还财政权于民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李炜光(51)
财政历史惊心动魄 财政改革付出代价——简要评价我国历史上几个财政改 革家	谭建立(59)
古代灾害救济是挽救社会危机的基础	王文素(72)
试论我国的商税起源	黄天华(91)
春秋战国财政改革述论	刘孝诚 张 娟(104)
唐代盛衰与财政制度	史 卫(120)
雍正年间财政改革对当今的启示——评火耗归公和养廉银的发放	陈光焱(126)
清末偿付“洋款”的态度与交涉	申学锋(138)
清末的财政危机与政府的财政对策	付志宇(144)
清末民初中国教育财政制度的近代化转型及其启示	周春英(150)
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近代鸦片流毒云南	赵仁平(159)
惊心动魄裁厘路——国民政府裁厘成败探析	张劲涛(164)
从地方公债的“断与续”看其必然性	宋 燕 叶 青(172)
我国地方债历史研究——基于 2009 年财政部代理发行 2000 亿地方债的思考	许 晖(180)
中西古代税收博弈浅谈	洪 钢(185)
中、英、法三国封建社会财税体制与政体路径分析	马金华(191)

先秦时期的财政与民生

孙 翊 刚

财政，中国古代不叫这个名字，开始时多从赋税而名，如享、贡、赋、税、租等等，后来，地域广了，人口多了，财物较以前丰富了，于是，管理人员逐渐增多，管理机构也逐渐专门化，后来，把国家财政则称呼为理财、财赋、国计（经国大计）、财征、国用等等。可见，财政同国家有着密切关系，是国家行政的物质基础；同时，财政同民生（人民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民要依法纳税，财政要保障民生，所以，财政与民生自古以来就是当政者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们要在一篇文章里来论说清楚肯定是不行的，但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却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

具体到先秦时期，则又是一个难题，因为这个时期包括的时间太长，从传说的三皇五帝到统一的秦帝国也有上万年的历史，更何况其中大部分时期没有文字记载。因是之故，我们一些人对史前的传说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上古缺少文字记载就对传说的历史一概予以否定。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①言自尧舜二帝至于商汤，其年数有五百余岁矣，如禹、皋陶为尧舜之臣，则亲见而知尧舜圣人之大道而佐行之也，而汤王之去尧舜之世则相去有数百岁之远，则其二帝所行之道遵而行之者也。这就是说，传说的内容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其依据的。为此，前人的态度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②。至于近代，我很赞同翦伯赞先生的态度，他说：“我并不是否定神话与传说，反之，我以为神话与传说，并非好事者之凭空谎造，而皆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不

孙翊刚，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财政经济研究所所长，我国著名财政史研究专家，现已退休。

① 《孟子·尽心下》。

② 《史记·三代世表》。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过传之既久，由于言语异音，文字异形，便难免讹伪百出”^①，这是我们学习历史应该注意的。

我们知道，财政产生的基本条件是剩余产品、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为探求早期的财政形态，我们的研究应从传说时代开始。相传：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②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蠃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瘠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③

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④

可见，发展到神农氏族晚期，农业生产已基本确立，并且有了简单的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已经建立了一个权力中心（领导集团），他们的职责主要是按古书所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心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纷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力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⑤，从这段文字看，这时还没有形成国家，不过，对生产成果是要进行考核的，相应的在氏族内部也应有一定的分配和核算。

我们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又说炎帝即神农氏。为此，我们再来看看黄帝时期的经济和生活状况。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利……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籍，万官以治，万民以察。^⑥

轩辕之时，神农氏势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⑦

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⑧

黄帝之时，以玉为兵。^⑨

昔者黄帝治天下……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岁

① 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周易·系辞下》。

③ 《淮南子·修务训》。

④ 《周易·系辞下》。

⑤ 《淮南子·主术训》。

⑥ 《周易·系辞下》。

⑦ 《史记·五帝本纪》。

⑧ 《庄子·盗跖》。

⑨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

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诸北、僇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①

据此看来，黄帝时期还属于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并未建立正式的国家。他们的公共开支，还主要靠自己集体劳动所得的提成。至于周边各小部落的贡献，是属于加盟的一种形式。

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其生产生活情况则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据史书所说：

尧时，“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②。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③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粢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④

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于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穀，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岂其奉养不足乐哉！举天下而以为社稷，非有利焉。^⑤

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者众。^⑥

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放讎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鲧于羽山。^⑦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⑧

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⑨

① 《淮南子·览冥训》。

② 《孟子·滕文公上》。

③ 《淮南子·本经训》。

④ 《韩非子·五蠹》。

⑤ 《淮南子·主术训》。

⑥ 《淮南子·齐俗训》。

⑦ 《淮南子·修务训》。

⑧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⑨ 《韩非子·十过》。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①

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②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③

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蛄，民皆上邱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守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④

三岁考绩，三考黜陟幽明。^⑤

三岁一考功，三考黜陟，远近众功咸兴……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⑥

禹亲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⑦

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耜以为民先。^⑧

(禹)惟荒度土功。^⑨

禹见耕者耦立而式。^⑩

禹沐浴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⑪

(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⑫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洫。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橧。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⑬

① 《史记·五帝本纪》。

② 《淮南子·修务训》。

③ 《孟子·滕文公上》。

④ 《淮南子·本经训》。

⑤ 《尚书·舜典》。

⑥ 《史记·五帝本纪》。

⑦ 《庄子·天下》。

⑧ 《韩非子·五蠹》。

⑨ 《尚书·益稷》。

⑩ 《荀子·大略》。

⑪ 《淮南子·修务训》。

⑫ 《论语·泰伯》。

⑬ 《史记·夏本纪》。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①

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使九牧贡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②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③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璫（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④

从以上所记资料来看，至少在舜禹领导时期，在我国中原地区，已经初具国家雏形。然而学界对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的观点，如有的学者认为，尧舜禹时期只不过是已进入大规模史前农业或畜牧生活时期，而且这种农业生产和畜牧活动，还是集体进行的，因而土地和农产品、畜群都是集体所有产品。他们耕而食，织而衣。但无私织私耕，共寒其寒，共饥其饥。我们认为，在尧舜禹时期，并非全部都是公有制，而且也不能把集体生产劳动就认定是氏族社会的表现。恩格斯认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此外，还有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能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二是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恩格斯所提的几个条件，到尧舜禹时期已经基本具备，当舜命禹主持治理了多年泛滥成灾的洪水之后，又重新划定居民区域，并进一步完善了赋税征收制度，使黄河流域一带居民获得了安定和发展的机会，尧舜禹的统治地位也得到了巩固。之所以这么说，一是水患问题是一个长期严重影响当时居民生活质量的大问题。在尧统治的70年间，虽然多次派人主持修治工作但始终未能达到治理的目的；禹接受任务之后，由于舜下了死命令，所以13年间坚持在抗洪第一线，经过对江河、山林、陆地、沼泽地等的详细勘察，开通道路、准备器材，率领各地居民挖山通道，该疏则疏，该堵则堵，最终使洪水流入大海，洪水得到平治，“洪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治理洪水这么大的工程，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政权）是难以完成这份工作的。二是划分居民区（行政区划），在氏族社会，以一个或几个部落为一区，虽然区域大小不一，但很难逾界；建立国家以后，以各部落为基础，划区行政，并制定了一套全国通行的行政管理和赋税制度。此前在洪水未能治理时，这种行政区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破。“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卿，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譬若播棋丸于地，圆者走泽，方者处高，各从其所安”。但是，在尧的统治时期，最大的问题是洪水为患，史称“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① 《尚书·禹贡》。

② 《虞荔鼎录序》。

③ 《史记·封禅书》。

④ 《尚书·禹贡》。

下民其咨”^①。由于洪水常年肆虐,居民为水所苦,被迫逃走四方。据《尚书》说,舜时“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可能这个区划维持时间并不长就被洪水打乱了。后来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又划定为九州(“禹别九州”)。这里的十二州当指十二牧,即十二个地方邦国或部落联盟;九州,也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州,是指九个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划。当时国土面积不如今天这么大,也不如今天这么规范,这里只是说明大禹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调整了原先的行政区划,划地居民,并且组织区域内的人民开垦土地,生产生活。

大禹治水经过考证,证明确实有这么回事。据《北京晚报》2002年10月21日报道,入藏保利艺术博物馆的距今2900年前的西周遂公盃上,有长篇铭文,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墮)山,浚川……”记述大禹疏导河流、平治水患、划定九州、确立赋税缴纳制度的情况。

关于夏商的土地分配,多少年来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古代不可能存在井田这种形式,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指古代的土田和沟渠灌溉系统,后人称此为井田。据考古发掘,在今江苏苏州吴县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距今6000多年前的水稻田和排灌系统遗址:东区有古水稻田33块,水沟3条,水井6个;西区有水田11块,水沟3条,水井4个,大水塘2个。稻田呈长方形或椭圆形,成行排列。此后,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也发现距今6600余年前的古稻田遗址,清理出3条田埂,二丘田;与田相连接的还有3条水沟和水坑。这种水田基本成列、有灌溉系统相连的原始稻作农业,说明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②可见,“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是对中国古代稻作农业的一种肯定。而大禹治水也是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安定民生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和努力。而这一流传数千年的神话,在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展示了它本来的面目。所以,司马迁在所著《史记》中,总结历代的资料,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后人顾炎武也说:“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已”^③。

我们根据以上情况可以得出四点结论:1. 在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国已在华夏地区根据土地自然资源情况,对所属居民按区域进行了组织和划分。而在禹治理了洪水之后,才基本稳定下来。2. 古代井田之制,是当时沟渠排灌系统的实际反映,后来因分配事务的需要,而又赋予其作为劳动考核、赋税征收的基本单位的功能。3. 贡赋制度是从氏族社会因公共事务需要而对居民的收入所进行的提成演变而来。而周边方国部落的贡,则是表示加入部落联盟的物质表示。而国家贡赋的确定,又考虑了均平(公平)、有利民生的原则。4. 当时的国家首脑被后世称赞为圣王,是因为他们重视民生,在他们的努力下,生产得到发展,居民生活得到改善。

人们普遍认为,国家财政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国家形成之前,当公共

① 《尚书·尧典》。

② 陈文华:《农业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2页。

③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

权力出现时，相应地也产生了贡纳，这种观点，恩格斯也是肯定的。不过，在早期社会里，人们还没有养成贪欲以前，这种分配（类似误工补贴）还在居民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还是比较合理的。但这种分配，既然是统治阶级——权力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从居民的劳动收入中提取的，尽管是“头会箕敛”，也有一个取多取少（应贡纳者家中人多入少、剩多剩少）、给谁不给谁以及取予的有形无形、直接间接等多种关系的问题。当取之有道、用之有节时，社会就安定，经济向前发展；当取之无度，用之失公时，轻则人们不满，口出怨言，重则发生动乱，严重的则使国君倒台，政权崩溃。

从历史上考察，酋长、王、天子，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摆在人们的眼前。《通典》说：“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设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此井田之由也。就是说，井地分配不合理，就会产生争端，为防争端的发生，史称“轩辕之时，神农氏势衰，诸侯相侵伐，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氏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①。虽然在分配问题上，直到舜禹时期仍然十分谨慎，坚持公正办事。如“禹乃相地宜所有以贡”^②，“禹平洪水，定九州，制井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③。但在夏代统治的近500年中，也不免乱政。史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④。那么，有夏代的乱是指什么？原因何在？我们根据史籍记载，专家学者的研究分析，梳理出如下线索：史称禹、益共同执政10年，由于此时私有制和社会变革加快，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天下未洽”。禹死后，诸侯归启，在位9年崩。墨子称启始执政时是贤王，到启晚年失德，“淫逸康乐，野于饮食……湛浊于酒，渝食于野”^⑤。湛，淫；浊，乱也；言饮酒无度。渝，当读为“输”音，游田无度，匿食于野。其子太康在位时，溺于游畋，旬日不归，被有穷氏之君羿取代帝位，遂失国。受这一重创，厥弟五人，在其母的诱导下，述大禹之戒，立下共守的信条：一是“民维邦本，本固邦宁”；二是记取教训，“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三是“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⑥。三传后到少康复位，“复禹之绩，祀夏配天”^⑦，振兴农业，治理水患，使夏王朝又重新振作起来。此后，八传到孔甲，又开始走向衰败，《史记》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下》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隕”。应该说，夏自孔甲开始，夏王朝已在走向末世，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日益激发，四世之后，夏桀更加昏暴，“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这就是说，自孔甲以来，夏王丧德，从而造成民人离散，联合体分裂。那么，这个德是指的什么？一般理解为“修养而有德于心”。《易·乾》曰：“君子进德修业”。《礼记·曲礼》说是“道德仁义”。

① 《史记·五帝本纪》。

② 《史记·夏本纪》。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左传·昭公六年》。

⑤ 《墨子·闲诂·非东上》。

⑥ 《尚书·五子之歌》。

⑦ 《左传·哀公元年》。

德,也指行为节操,在心为德,施之曰行。《大戴礼》说:“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论吏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为有德,能行德法者为有行,能理德法者为有能,能成德法者为有功。”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其德的表现是什么?按孔子所说:“为政以德”^①。《帝王世纪》称少皞(昊)有圣德。但“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神民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②《刘恕外纪》也作出类似表述。

禹曾经向舜建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③孔子云:“为政以德”。《疏》引正义,政之所为在于养民。养民者使水、火、金、木、土、谷六事当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德谐和之”,又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利用者,谓在上节俭不靡费,使财货殷阜;利民之用,为民兴利除害,使不匮乏;厚生谓薄征敛,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故所以养民也。”可见,君王之德,与民生有着重大关系。

按史书零散的记载,夏桀暴虐,不能施德于民,致民心离散。表现在政治、经济和生活等多个方面。

(1) 为美女而征发诸侯。如伐有施氏得妹喜,伐岷山氏(有缙氏)得琬、琰三女。

(2) 以事征伐诸侯。桀为仍之会,有缙叛之,故伐而克之。今本《竹书纪年》系于十五年。“会诸侯于仍,有缙氏逃归,遂灭有缙。”

(3) 大兴土木。《竹书纪年》记夏桀“筑倾宫”。《文选·东京赋》注引汲冢古文云:“夏桀作倾宫、瑶台,殫百姓之财。”

(4) 奢侈淫乐。“桀为酒池,可以运舟;漕丘足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古之人君,身行礼义,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今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夭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④

因此,《淮南子》云:“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山无峻干,泽无洼水,狐狸首穴,马牛放失,田无立禾,路无莎蒺。”^⑤当此之时,夏桀仍自诩其统治如太阳之永久,他说,“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⑥而其统治下的人民则难以忍受,呼号:“我后(桀)不恤我众,舍我稼事,而割夏正”,又说“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这是说,夏桀既夺民农功,行割剥之政,其君臣还相率为劳役之事,以绝众力。无奈之下,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⑦

① 《论语·为政》。

② 《国语·楚语下》。

③ 《尚书·大禹谟》。

④ 《韩诗外传集解》。

⑤ 《淮南子·览冥训》。

⑥ 《史记·殷本纪》。

⑦ 《尚书·汤誓》。

人们宁愿同桀一块灭亡，可见人民已经忍让到了极点，桀最后为汤所灭。

传说汤的始祖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史称“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①从历史及传说中获知，商族是一个不断进行迁移的民族，其原因可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史称“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②。直到夏王朝末期，才迁入夏的统治区。当时，“桀为暴虐，诸侯内侵”^③，而商汤趁着夏王朝走向衰败的好时机，对夏氏族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史称“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④。

汤用伊尹伐桀代夏有天下后，也曾多次迁都，据称自汤至纣，凡六迁。商王迁都，也不是每次都是顺利的，它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特别是盘庚迁殷之事，盘庚软硬兼施才最后迁都于殷。当时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冲突？据分析有如下几个原因：

(1) 避水患说。《尚书·盘庚》中说，“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即水患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影响到商王的统治。

(2) 去奢行俭说。指当时的商贵族已经十分奢侈。

(3) 游牧游耕说。认定盘庚时期，殷仍处于游牧经济时期。

(4) 殷王室内部的矛盾加剧，政治斗争日显尖锐。

这就是说，他们需要在迁都中寻找理想的环境。在对夏及其周边的氏族发动战争中寻求生存环境和创造繁荣。他南征荆楚^⑤，西伐鬼方，并远征西夏，使氐、羌之族臣服。在征战过程中扩大了疆土，也获得了巨大财富：俘虏、畜群、财物，同时也获得了每年例行的贡纳。史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⑥

从史籍记载来看，在商王统治的六百年中，由于工艺技术的革命，青铜工艺的快速发展，金属农器具的应用和牛耕的推广，这一切都促进了农、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殷代经济的繁荣，大大超过了夏代的水平。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财税制度的改革，商代的井田制较夏代又有了进步；而田赋的征收，改贡法为助法，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可靠。孟子在比较三代田赋制度的优劣时引用龙子的话说，“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⑦又说，“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⑧。可见，孟子是赞同助法的。当然，作为早期夏王朝的国家财政，因为当时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剩余产品有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同上。

③ 《后汉书·东夷传》。

④ 《孟子·滕文公》。

⑤ 《诗经·商颂·殷武》，“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

⑥ 《诗经·商颂·殷武》。

⑦ 《孟子·滕文公上》。

⑧ 《孟子·公孙丑上》。

限, 财税征收制度并不完备的情况下, 因陋就简, 作为贡法未尝不是适宜之制。就是自夏以来整个夏商周三代, 国家财政收入仍以公田收入为主, 其次是诸侯、方国、部落之贡和战争俘获收入。在商代的 600 年中, 仅从当前发现的甲骨文字的记述中, 其有关农业、祭祀、征伐、贡、劳役等等的卜词就有相当多的数量。当然, 在赋役征收中, 不乏强制行为, 如前所引, 从汤建国开始, 西方的氐羌各族都必须定期来贡, 不敢有误, 这就说明赋、税、役、贡等国家收入一开始就具有强制、固定、无偿等特征。必须看到, 在商王朝统治的 600 年中, 并不都是经济繁荣, 顺风顺水的发展的, 它同夏王朝一样, 由于环境的改善, 生产的发展, 物产的丰富, 统治者的欲望也日益膨胀起来, 剥民以肥己, 长此以往, 造成社会动荡, 据《史记·殷本纪》所记, 归纳起来有如下几起几落:

“帝太甲既立三年, 不明, 暴虐, 不遵汤法, 乱德”, 被伊尹流放于桐宫, 悔过反善, 三年后归位。

帝雍己时, “殷道衰, 诸侯或不至。”

帝大戊, “殷复兴, 诸侯归之, 故称中宗。”

“河亶甲时, 殷复衰。”

“帝祖乙立, 殷复兴。”

“帝阳甲时, 殷衰。”

“自中丁以来, 废嫡而更立诸弟子, 弟子或争相代立, 比九世乱, 于是诸侯莫朝。”

帝盘庚之时, “乃五迁, 无定处, 殷民咨胥皆怨, 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 ‘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 法则可修。舍而弗勉, 何以成德!’ 乃遂涉河南, 治亳, 行汤之政, 然后百姓由宁, 殷道复兴。诸侯来朝, 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小乙立, 殷复衰。”

“武丁立……得说于傅险中……武丁修政行德, 天下咸驩, 殷道复兴”。

“帝甲淫乱, 殷复衰”(帝甲乱之, 七世而陨)。

“帝武乙无道”。

“帝乙立, 殷益衰”。

“帝辛立……淫乱不止……赴火而死。”

史称, 殷自中丁以来, 弟子争位, 几代不安, 至祖乙时有所复兴, 但起色不大, 盘庚时进行了一次大的整顿, 殷道得以复兴, 但积弊已深, 衰败之象已成。后期之君, 不是无能, 就是无道, 传至帝辛, “天下谓之纣”, 虽有材力, 但不务正, 史书是这么说的: “帝纣资辨捷疾, 闻见甚敏; 材力过人, 手格猛兽; 知足以距谏, 言足以饰非; 矜人臣以能, 高天下以声, 以为皆出于己之下。好酒淫乐, 嬖于妇人。爱妲己, 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 北里之舞, 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 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 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 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 以酒为池, 悬肉为林, 使男女裸(裸)相逐其间, 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 于是纣乃重刑辟, 有炮烙之法……九侯有好女, 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 纣怒, 杀之, 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 辨之疾, 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 窃叹。崇侯虎知之, 以告纣, 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闢夭之徒, 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 纣乃

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纣）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①

从上可见，殷纣王依恃自己的聪明才智，刚愎自用，文过饰非，拒谏贼贤，横征暴敛。贪图享乐，筑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集解》引如淳语，建钜桥仓，大其器而厚赋税）”。纣自焚时，取天智玉琰缝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又记“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②。殷末各王的贪婪、暴虐，《淮南子》也作了如下表述：“末世之政，田渔重税，关市急征，泽梁毕禁，网罟无所布，耒耜无以设，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殫于会赋”^③。至于武王伐殷时所作的声讨（宣言），则更是有力：“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剥剔孕妇，皇天震怒。”^④

武王灭商，可以理解为公私兼顾。既为民解困，又为民报仇。因武王割了商王的头，古代属于诸侯弑君，曾经受到后人非议，而武王灭商三年后，因病而死，其子年幼，这时爆发了一场争夺中央权力的战争。最后周公胜利了，周王朝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西周的经济仍以农业为主体。史称西周的始祖是后稷，名弃。尧时“举弃为农师”，舜以“后稷播时百谷”，所以《史记》说“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其后代公刘、古公亶父“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使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成王即位后，在周公辅佐下，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正其疆界，《诗》云：“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谷。”其次，成王亲自到田间考察，劝导农事。《诗》云：“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饁彼南亩，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第三，分别情况，分开管理。史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封鲁公（伯禽）于曲阜，“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旅，将其类丑（众）以法则周公”；“分之田倍敦”。周王因周公辅国有功，封周公之地方七百里。按郑玄所说，周制：公之地方五百里，加鲁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井，得七百里，受周公之法制，昭周公之明德。封康叔（周公弟）于殷故地，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于有阎之土，以供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正义》引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是言王者布政当顺民俗而施之也。此民习商之政为日已久，故在因袭殷人风俗的同时，用周法疆理其土地。封唐叔于晋地，一姓九族，“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因此地原为唐之余民，太原晋阳为大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周书·世俘解》。

③ 《淮南子·本经训》。

④ 《尚书·周书·秦誓》。